

海登·怀特的“中间语态”理论及其 对历史书写的启发

李根 周巩固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海登·怀特于1990年提出历史书写应该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写法,运用一种自我解构式的中间语态书写。在这种写法中,作者除了讲述历史,还要把作者书写历史的过程也作为讲述对象,呈现一种“作者内在于写作之中”的状态。怀特认为这种写法尤其适用于史料说法不一、真相难辨的历史事件书写。历史以解构性的中间语态书写,将使作者主导叙事的权威性和叙事脉络的连贯性被削弱,使过去与当下呈现为一种意义互动的关系。怀特的中间语态有其相对主义预设,但其表现复杂历史事件的写法对当代史的书写有所启发,它适合20世纪以来史料海量、影音化的趋势,以及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复杂性的诉求。

[关键词] 海登·怀特 现代主义 中间语态 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3)01-0089-10

二十多年来,海登·怀特在我国史学理论领域影响力巨大。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他一直在通过分辨历史作品中的修辞属性,挑战历史叙事的可靠性,可他却没能给出解决这一学理困境的办法。^①不过,从怀特的作品中看,他一直在思考历史学如何进行如实书写的方法。1990年,怀特在讨论纳粹大屠杀的“创伤叙事”话题时,提出应借鉴“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现实的笔法,以一种“中间语态”的方式书写历史。^②他关于历史书写方法的探索由此明确展开。怀特所谓的“中间语态”,是书写者处于“作者内在于书写行为之中”的主、客位兼具的状态,边叙事、边自己审视和解构自己的叙事。这种历史书写主动突出语言表达的不稳定性,侧重如实表现历史怎样成为文本的过程。学界多讨论怀特如何解构历史书写,但关于他如何书写历史的论述有待深入分析。目前,已有学者讨论其关于借鉴文学书写历史的思路,但并未就他专门提出的“中间语态”理论做系统解读。^③有学者

[收稿日期] 2022-11-24

[作者简介] 李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周巩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卡罗·金兹堡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研究”(18BSS005)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陈新《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海登·怀特研究在中国(1987—2018)》,《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1期,第125页。

^② Cf.,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7-53.

^③ 参见李理《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中的行动者》,《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1年第3期;李珺《“实践的过去”:历史编纂学的文学转向》,《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提及了怀特“中间语态”理论在“创伤叙事”中的适用性^①，但该理论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大屠杀书写的伦理问题。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语境中讨论“中间语态”理论的特征和价值。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解析“现代主义”文学的“中间语态”书写的特征、表现机制，及其对历史书写问题有何助益，着重探讨以“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何以呈现，最后诠释这种历史书写理论的可借鉴性，及其在当代历史学书写的发展局势中，处于怎样的学理地位。

一、自我解构的“现代主义”文学笔法

怀特在《元史学》中论说历史叙事本质上是诗性而非实证，这早有争议，而他要求历史书写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写法看起来更易遭反感。同时，怀特在阐述这一思路时往往多使用文学概念，读者接受起来就更多些障碍。因此，有必要首先讲明何为“现代主义”文学及其“中间语态”笔法，继而方能理解怀特为何提议将此写法用于历史书写。

首先，怀特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解构是对语言相对性的一种有效应对。怀特所指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观念上有似史学的后现代主义，强调语言表达总是处在难以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他说：“现代主义(modernism)的特点是对语言的不确定性已有超自我意识，以及认为无论文本的表面指涉物是什么，语言已经以某种恶魔的能力侵入话语内容之中。”^②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对象是文学的现实主义，后者的观点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所质疑的客观主义史学。怀特将之一概称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在小说中有……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现实主义在历史中有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现实之代表，让事实‘为自己说话’，追求一种消除任何寓言元素的话语表达。”^③可是，以文学的现代主义和史学的后现代主义之见，现实主义文学和客观主义史学的书写“总是意义多于字面的言说，它们总是言说不同的意味，而且，只能以隐蔽世界为代价来揭示世界。”^④这其中，质疑的关键不在于文学家或史学家揭示的世界是否如实，而是作者将不如实的叙事宣称为事实在“为自己说话”。如怀特所说：“文学或者历史编纂学不需要被解释成一种自觉建构的工具，用以使社会成员坚信某些学说的真实性”。^⑤藉此，怀特认为如果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一样，都摆脱不了语言本身对事实表现的曲解，那就可以借鉴现代主义文学应对语言相对性的策略。他说：“正由于历史话语运用了在纯文学虚构形式中发现的意义—生产结构，现代文学理论……才直接相关于当代的历史书写理论。”^⑥

现代主义文学的书写在叙事的同时，主动进行自我叙事的解构，以此消解以往写作中作者营造的叙事连贯性和真实感效果。如怀特所说：“在现代主义之后，一旦要讲故事，无论是在历史写作还是文学写作中，传统的叙事技巧都变得无法使用……它抵制对事件和人物行为进行情节化的诱惑。”^⑦现代主义文学承认语言的不可控性，因此不追求自我书写的信服力，而是暴露自己对简单事

① 参见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国外文学》2008年第4期；王霞《如何再现纳粹屠杀——海登·怀特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霞《直面纳粹屠犹的理论维度——海登·怀特的“边界”与汉娜·阿伦特的“越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章册《伦理转向中的海登·怀特——极限事件与文学再现》，《东吴学术》2017年第4期；赖国栋《创伤、历史叙事与海登·怀特的伦理意识》，《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海登·怀特《现实主义表现中的文体问题》，载于海登·怀特著，罗伯特·多兰编《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

③ 海登·怀特《现实主义表现中的文体问题》，载于《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第226页。

④ 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

⑤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⑥ 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19.

⑦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74.

实进行主观加工的过程。在这种书写中,读者会看到作者对叙事的无力感。怀特对此描述道“现代主义表现的技术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它祛除了关于事件以及幻想陈述事件的执念,将自嘲如表现事实的过程中造成的威胁拒之门外,而且,也为哀叹(mourning)的过程扫清了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历史学的重负,并对当前可能的问题形成更为如实地(realistically)感知。”^①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叙事解构,至少不再无谓地坚持现实主义那种本就做不到的祛除虚构求得事实的念想。通过呈现历史书写的实际过程和细节,毕竟做到对叙事局限性的坦诚。如他所说“现代主义解决了传统现实主义所设定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干脆抛开在事实与虚构的对立之间作诠释的现实主义基础,现实地表现现实(represent reality realistically)。”^②这体现了写实性书写的矛盾关系发生变化。现实主义写作要克服的是别人写作(史料)中的虚构,现代主义的斗争对象是自己写作中的虚构。

其二,怀特将现代主义文学的自我解构方式归纳为“中间语态”理论,提出作者应以“内在于书写行为之中”的状态进行叙事。他就此说“在文学现代主义中,‘写作’这一动词既不意味着主动关系,也不意味着被动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中间关系。”^③“中间语态”本是怀特从罗兰·巴特处借鉴而来的概念。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中,巴特提出“不及物性”的写作概念,即“在写作(to write)这个中间语态的现代属性动词中,主语被设置为与写作是几近同位的,也受到写作的影响。”^④怀特则进一步解释道“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中,动词的主语被设定为是外在于行动的,不是行动者便是被动者;而在中间语态中,主语被设定为内在于行为之中。”^⑤所谓“主语内在于行为之中”是一种主语做出行为同时也是该行为的受动者的状态,如“我打我自己”。在这里,“我”与动词既是主动关系又是被动关系,既是“打”的发出者,也是“打”的施加对象。我打的正是那个在挨打的我。如果将“打”这个动词换做“写作”,那么作者在写作,同时自己也是被写作的对象,即“作者内在于写作行为之中”。这就形成了作者、写作和作品之间颇为玄妙的层次关系。通常对作者书写的理解是,作者只是书写作品这一个内容。可是在中间语态中,作者有两个写作对象,一是他要写作的故事,二是自己在写作中时不时产生虚构念头、又不得不压制这种念头的心路历程。

实际上,怀特借用法语中颇抽象的不及物性语法和古希腊语中的中间语态,解释了一个并不玄奥的逻辑。一个直观的例子足以说明中间语态书写的特征。我国作家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后由导演姜文拍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描写主人公盯着心仪的女孩与男伴在自己面前嬉闹,醋意大发,故意挑衅引发斗殴。这时叙事陡然停止,作者开始剖白自己想要讲述事实、却又禁不住总把情节虚构得更具冲突性的复杂心理状态: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有一秒钟,我们两张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

①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67.

②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67.

③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48.

④ 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Roland Barthes, *The Rustle of Language*, Richard Howard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19.

⑤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48.

真实。^①

由此例可见,中间语态书写(有时也被怀特称为“不及物书写”)大概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它的预设是作者本身并不能如意地驾驭文字、如实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2.作者自己与讲述的故事共同作为写作对象。作者一面讲着他想表达的内容,另一面不断坦言自己在何处的书写并不如实,解释自己试图克制虚构的苗头却又失控的状态,即作者“内在于写作行为之中”。3.其结构是双时间线的复式叙事结构,因为它边叙事、边自我解构叙事,因此,所讲的故事是一条线,作者与写作的虚构走势斗争又是一条线。

其三,怀特认为对于史料说法不一、真相难辨的历史事件,应采用现代主义文学的中间语态书写。他说“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对现实主义规划的拒斥和对历史的否认,不如说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历史现实的期待,这种现实被包裹于据称为难以想象的(unimaginable)、难于思考(unthinkable)的以及难以讲清的(unspeakable)的向度之中。”在他看来,这种现实是“一种深感我们的科学无力解释的现象”,且“我们传统的表现模式甚至没有能力对它们进行恰当描述”。^②在《现代主义事件》一文中,怀特提到了关于晚近事件的材料越发复杂并难以概全的状况“任何试图对事件提供客观描述的尝试,无论是通过将其分解为大量细节还是将之置于其上下文中,都必定搅入两种局面:一是任何单一事件中供辨别的细节都可能难以计数;另则任何单一事件的背景都无限广泛,或者至少是不可客观确定的。”因此,“传统上被认为可观察且能观察到的事件,已被定义为不再可以观察到的事件……”^③怀特最初是在参加1990年举行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表现问题的会议上讨论了历史事件难以描述清楚的复杂情况。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表现版本庞杂且彼此颇有出入,因此怀特提出“不及物写作(即中间语态书写)的成果……或许能够成为所有关于大屠杀的或历史或虚构的表现的典范。”^④

须指出,怀特基于纳粹大屠杀事件提出以现代主义的中间语态书写“难以描述”的历史事件的想法,并不是说他认为大屠杀是历史书写问题中的特殊性事件,而是该事件众说纷纭的局面证明历史书写需要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来表现历史的复杂。他说“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比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事件更加无法表现。只是在历史或小说中对它的表现都需要一种风格,一种现代主义风格。”^⑤显然,怀特提出的历史的中间语态书写理论并不仅限于“创伤叙事”的伦理问题范畴。他更重视揭示事实本身的复杂性与历史叙事工具的有限性之间的不适应关系,并试图找到表现历史复杂性的合适工具。怀特之所以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叙事谈起,是因为他注意到时间上越接近现代的历史事件,事实真相就越显得扑朔迷离,而最适合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中间语态”笔法。如他所说“在关于表现大屠杀的讨论中碰到的那种异常、谜团和困局是一种话语观念导致的,这种话语观念过多地依赖一种现实主义,而它不能恰当地表现如大屠杀这样其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事件……”^⑥可见,怀特并不认为所有历史事件的书写都应以“中间语态”书写,他强调现代主义文学的笔法与现代历史事件书写的适用性。

由此可见,怀特借鉴文学笔法书写历史的提议,并不是他以相对主义立场对历史叙事真实性的

① 王朔《动物凶猛》,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2页。

②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p.51-52.

③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71.

④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48.

⑤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52.

⑥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50.

又一番调侃。彼时的(20世纪90年代初)怀特不是在暗示史家撰史可以如文学写作般天马行空地恣意想象。他那时提出借鉴文学笔法有其“现代主义”风格的特定指涉。他需要的是表现复杂现实观念和手法,而不是降低表现真实的标准和规格。

二、以中间语态书写历史的结构变化

怀特谈及中间语态的史学运用,只是探讨历史书写的方法。它不直接涉及如何发现未知事实和核证存疑事实的问题。如怀特所声明“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此考虑的问题不是用来探讨过去的研究方法,而是探讨历史书写的方法。”^①现代主义文学的中间语态书写是一整套不同于以往叙事的书写体系,若将之运用于历史书写中,意味着其整个叙事结构将发生系列变化。作者讲史的权威性、叙事脉络的连贯性和所述事件的不可逆性,这些被认为历史书写的应然特征,在中间语态的历史书写中皆会被动摇。

其一,作者在“中间语态”历史书写中不是以讲史权威的身份出现。史家主导叙事的公信力一直以来大体是被接受的。虽然历史怀疑论的声音始终存在,但史家权威性的内在逻辑有其合理性,即史家自己和读者均认为,史家对于所讲述的内容做了更多调查,比读者更了解所要讲述的事情。因此,当《历史》的开篇宣称“发表在这里的,是哈利卡纳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时,^②这实际上是通过剖明史家讲史的权威性,强化作品的信服力。尽管史家在书写中也会交待研究结论的局限,如类似“受史料所限”“这仅是我当前所能知道的”等,但这不是为了消减史家的权威性,而是负责任地明确所述历史的可靠性范围或程度,是在为自己的叙事权威性廓清限制条件,保持自己叙事内容的稳定性。

相比之下,在以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中,史家在叙事同时需要进行对自我叙事的解构,作者讲史的权威性将被弱化。这种情况下,作者“内在于写作之中”,自己写作的过程也是书写所表现的对象。因此,作者在史料上遇到的困境,特别是史家如何将一系列片段性的信息连贯成叙事,如何用推测、想象或不可靠的史料填补叙事链条中的缝隙,都将是“中间语态”历史书写的对象。怀特称这种效果是“避开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放弃对故事线的控制……允许那些挑战我们信赖自己的视听感知能力的事情发生”。^③修昔底德声称他的讲述是“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④可在怀特看来,这种做法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相当于作者在幕后自作主张地裁定史料。怀特认为,作者应当将“仔细考核”的过程也表现出来,“解构掉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的神话”,消解史家“能够模仿性地再造世界,期待自己关于世界的想法毫无显著错误或歪曲”的印象。^⑤在“中间语态”中,史家不是隐匿于叙事之后的真相代言人,而是同自己的书写一样,都是可透视的对象。尽管他仍是关于过往的资深调查者,但必须放弃与事实单独面对面的特权。

其二,以“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叙事不具有流畅的连贯性。如前文所言,现代主义文学抵制在叙事中制造自身即为事实的效果,因此,“中间语态”的叙事重点不落在因果的坚实性上,而是有意识地破坏因连贯叙事而产生的真实性效果。怀特多次提到,“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指出了那种现代主义的‘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包括“在叙述者阐释那些看起来是以‘客观的’方式描述的事件时,主要采用‘怀疑和质疑的口吻’”;“不是将‘事件’表现为‘一个故事的连续剧幕’,而

① Hayden Whit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3.

②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③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85.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

⑤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actical Past*, p.78.

是将之表现为无序的发生。”^①之所以使叙事的内容遍布质疑和无序,其目的是使叙事看起来是一个文本,而不是事实本身。巴特将这种效果称为“信码的直接毁灭”。他说“只能‘暴露其弱点’,不断使期望中的意义忽然脱节(即超现实主义有名的‘颠簸’)”。^②

“中间语态”写作的非连贯性效果主要通过两种操作实现。一是它采用双线叙事的结构,使历史被讲述的同时也在被解构。具体而言,当事件的发展脉络被呈现时,史家也在以“中间声音”剖白讲述中的证据薄弱处和推测成分。在怀特看来,历史的讲述缺乏流畅性恰是叙事应有的样子。他引用奥尔巴赫的话解释道“人们总是可以道出历史和传说的区别:在传说中,事情的连贯性太过顺畅,不可能是真实的。”^③双线叙事中,作者的声音使叙事的呈现多了一个客位观察的视角。作者的声音不断从这个视角发声,不断提示着历史的讲述仅是经调查研究得出的判断,并非对事实的周全表现。二是叙事呈现关于事件的彼此冲突的多种说法,弱化了时间的线性特征。传统历史书写往往仅反映史家研究的结论,不同说法的彼此出入已由史家在形成叙事之前处理掉了,读者看到的是“剪辑完成”的故事线。而“中间语态”书写表现的是史家研究时看到的众说纷纭。在此语态下,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事件多种说法以及多重可能性的并置,而不是因果关系清晰的连贯叙事。怀特对此做了一个桌球比喻“文学式的现代主义修改了我们对事件的观念,使其不再具有母球击打目标球的清脆感和可感知性,不再可以用线性因果关系煞有介事地对之进行表现。”^④这有点类似希罗多德在交待希波战争起因时用了繁复的篇幅呈现的多种说法。只是希罗多德自己没有“内在于写作之中”,他的叙事还达不到“中间语态”书写的自我解构程度。

其三,“中间语态”书写将过去与当下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而非线性传承关系。传统历史叙事将过去表现为真正的事实,而“中间语态”的历史书写表现的是史家对事实的有限了解和触及真相的实际差距。这使得过去与史家书写的关系设定也发生变化。以往的设定是,历史事件具有时序不可逆性,先在决定后在。过去是怎样,史家就要怎样写。而怀特晚年开始着重强调“中间语态”的历史书写是在反映史家如何建构过去,突出叙事对过去的反作用。他称这种以“中间语态”建构的过去为“实践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他说“现代主义小说久而久之导致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创造,它与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兴趣对象不同。这就是我所称的‘实践的过去’。”^⑤“实践的过去”概念类似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它不是指过去作为文化传统对当下的遗传性影响,而是当下在过去中选择自己关切的对应特征,并反向建构过去之于当下的历史意义。易言之,只有当下在过去之中找到了对应现实的意义观照,过去才有实际意义,才成为历史。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史家将文艺复兴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由。二者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前者选择了后者作为自身意义实现的文化传统,后者从而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建构的历史本是历史书写最忌讳的形式。可是,在怀特看来,“实践的过去”是人们解释历史的常见方式,无法回避。因此他认为在过去无法被尽然还原的情况下,应该将后人如何建构过去的历史意义的细节阐述清楚。他解释说“什么是实践的过去?……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所有人左右的关于‘那个过去’的理念,我们不自觉地且尽其所能地在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信息、想法、模型、公式和策略中推崇这个关于‘过去’的理念——从个人事务到宏大的政治计划,只要遇到了被我们认为

① 怀特早在1990年就引用了奥尔巴赫对现代主义风格的特征概括,用以说明他提出的中间语态书写,参见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p.50-51。后来他又在解释喻象理论时再次引用了同样的内容,参见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100。

②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载于赵毅衡选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③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actical Past*, p.82.

④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actical Past*, p.78.

⑤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in *The Practical Past*, p.14.

是当前‘情况’的问题 我们都会仰赖的那样一种关于过去的观念。”^①以“中间语态”书写表现“实践的过去”将改变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逆性的叙事预设 过去与当下变成了一种并非单向因果而是意义互动的关系。

怀特在“中间语态”理论中突出“实践的过去”概念 这与他最初阐述这一理论的语境和论说性质有了较大变化。当年他提议“中间语态”书写时 意在追求一种如实表现事实复杂状态的新型写作模式 这种模式比回避了言语有限性问题的传统实证主义叙事观更直面历史书写的现实问题。尽管其批判意味颇重 但仍是在追求实证的语境内论说 理论性质是进一步地追求历史书写的真实。可是 他引入“实践的过去”概念 则试图把历史书写变成多数历史学家所担心的随意建构的行为。如他所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它对任何后来的群体进行追溯性挪用保持开放 这个群体可能会选择它作为其自身形成规划的合法原型 并因此作为其谱系学的一个元素。”^②这一变化使得追求如实表现历史复杂的实际状态的“中间语态”理论变成了现实舆论利用历史的合理性依据 其理论性质体现为彻底的历史相对主义。因此 有必要分阶段地看待怀特“中间语态”理论的指向性。它起初是怀特为克服历史相对主义、追求真实历史书写而提出的 但最终却又被他转化成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工具。

在以“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中 作者将让渡讲史的权威性 且事实不是被讲述的 而是通过冲突性的多重声音自行表现出来的。这体现出某些“公众历史”的特征。在叙事的“共享权威”状态 历史叙事的不稳定性反而成就了历史被感知的更稳定状态。^③不过 怀特关于以“中间语态”表现“实践的过去”的后续论说让其理论变了味道 为他本来颇具启示性的“中间语态”理论平添了争议性。

三、“中间语态”理论对历史书写的启发

若不谈“中间语态”理论的“实践的过去”部分 单从其关于表现事实复杂状态的洞见出发探讨其理论启示性 将看到它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的应用可能性。20世纪以来 人类记录、传播和读取信息的技术手段变化幅度空前。虽然有关20世纪之前的史料局面仍大体如前 材料局限限制了史家以新的形式书写遥远过去的历史。可是 对于书写留给后人的当代历史的史家来说 20世纪以来的史料变化使得史家的书写方式必然有所调整。书写当代史的史家不得不面对三种史料变化趋势 一是史家可能越发苦恼于处理海量信息的局面；二是包括文字、图像、音像、影像在内的多媒体影音化史料占比越来越大；三是在信息全面且深度共享的时代 史家与读者在历史作品中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如前文所述 侧重表现众说纷纭、真相难辨的事件 正是“中间语态”书写的特征。因此 该理论可以为当代史的书写提供模式参照。

其一 海量化的史料使事件越发复杂难辨 而史家如以现代主义的“中间语态”表现事件 则有助于更如实地表现事实的复杂性。“中间语态”边叙事、边解构叙事的效果往往是以多元声音破坏作者主导的叙事“信码结构”。在《现代主义事件》中 怀特提到了该文写作时(1995年10月)正在美国引起关注的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 以此说明现代传媒下事件被多层次表现的样态。他说“很明显 这次审判是另一起事件 而不是使之发生的事件的延续。”^④在怀特看来 记录美国社会理解凶案中的几个元素(黑人、白人、女性、明星)如何在事件发酵过程中发挥作用 以及记录媒体和民

①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p. 9.

② Hayden White, “Auerbach’s Literary History: Figural Causation and Modernist Historicism”,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3.

③ 参见迈克尔·弗里施《共享权威: 公众史学不是单行道》,载于李娜主编《公众史学·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4页。

④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p.85.

众在关注该事件过程中的狂热情绪(直升机拍摄、铺天盖地的报道、国务卿演讲推迟、华尔街股市交易量陡降、媒体打造辛普森为英雄等),要比凶杀真相本身反映着复杂得多的历史。这种信息被复杂呈现的情况在20世纪以后越发密集地出现。材料的丰富未必有助于史家更接近真相,但必然会令史家见识到事实的复杂状态。当史家深陷繁复的史料之中难辨真相之时,呈现事件的复杂性,大概就是最真实的历史书写形式。此时,“中间语态”的笔法可能就成为当代史家写史的合理选择。

其二,影音史料比重的增加使历史以“中间语态”那种作者“内在于书写之中”的客位视角书写更具可行性。相比于纯文字材料,影音材料带有显著的口述性,包含的细节量更大,特别是事件被回忆时的语速、语调、颤抖、停顿、眼神等都是与事实相关的切实反映,且可以被史家观察到。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上述这些细节可能在史家形成连贯叙事时就被过滤掉了。而在“中间语态”书写中,作者“内在于书写之中”,他对史料的解构过程也是书写的对象。因此,作者会以采访者、聆听者、观察者的客位视角反映事实被讲述的过程。影音材料中的言说或行为的种种细节,更有条件被史家表现出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强调过,“无意间留下的痕迹”是极其可靠的证据。他说“在人为意图最明显的证据中,文献明确向我们表达的东西已不再是今天我们优先关注的对象。我们以更多的热情去关注那些留给我们去理解却不愿说出来的东西。”^①“无意间留下的”证据在以往的史料中并不多见,但在更为口述化的影音史料中则会被密集地反映出来。就历史书写而言,“中间语态”正是针对口述性材料表现复杂事实的书写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影音化史料的优势。

其三,中间语态书写的自我解构兼顾了书写对读者体验的考虑。在信息显著多元化的时代,大众读取信息的渠道空前丰富。虽然史家的职业素养仍代表历史解释的最高层次,但他们作为过滤史料和解释历史的代理人的信服力已经在多元信息的网络化中有所下降。因为信息来源的多渠道使得公众越发了解事实的复杂局面及其被转化为文本的过程。因此,相比于史家以郑重的口吻宣称自己的研究深入并讲述自己主导的叙事脉络,中间语态书写为读者阅读的能动性留有更大空间。一方面,中间语态对自我叙事的解构使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更具透视性。作者以“内在于书写之中”的状态,为读者解构文本的内部情况。另一方面,中间语态着重呈现事件的多版本、多声音,消减了作者主导叙事对读者思路的诱导和限制,为读者自己体会事件、叙事、事实和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视角纵深。读者不再仅是获得史家给予的一种历史判断,而是可以自主地通过事实的复杂局面,感知到多种可能性的真相。

中间语态对叙事建构性的透明化和引导读者自主体会真相的思路就像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提出的“打破”表演之“第四堵墙”的理论。布莱希特说“通常人们演剧好像舞台不仅有三堵墙,而有四堵墙,观众所坐的地方就是第四堵墙。这样就造成和保持了一种假象,即舞台上发生的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事件……”^②作者主导叙事的历史书写就像是在四堵墙围起来的空间内再现某段过往。读者像观众一样看着安排好的情节。按照布莱希特的观点,表演应该“打破第四堵墙”,也就是让观众进入到情节建构和表演方式的各种可能性的思考中。他认为不是“把观众卷进事件中去”,而是“把观众变成观察家”;不是“触发观众的感情”,而是“促使观众做出抉择”;不是“用暗示手法起作用”,而是“用辩论手法起作用”。^③以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所营造的效果也将如此。历史的细节被表现为多种说法的龃龉,对因果衔接的不稳定性剖析代替了郑重其事的分析和讲解。尽管与戏剧表演相比,历史叙事的严肃性决定其权威性的共享更难实现,但历史书写的形式终究要在信息多元化和共享化的影响下有所改变。“中间语态”书写很可能成为历史叙事变革的一种参照形式。

^①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②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③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第104页。

四、余论

怀特的“中间语态”理论提出后,学界出现支持和反对两类声音。支持者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史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赞赏怀特的理论,并对其可能遇到的批评做了解释,认为“中间语态”书写被接受需要时间的考验。他说“我假定大部分历史学家……心怀疑虑,并且,他们肯定会把这些实验看作是对未来历史著述来说不恰当的模式。这是相当合理的。这些书肯定不是所有历史学家现在就要遵循的模式。”^①

阿瑟·马尔维克(Author Marwick)是反对者的代表。他认为怀特提出以“中间语态”书写“实践的过去”,是鼓动历史学家放弃对真实过去的严肃态度。^②不过,值得思考的情况是,有些学者在历史书写的实践中自发地使用了类似于中间语态的写法,但在观点上,却抵制怀特在理论上对于中间语态的论证。微观史的基础史料多是一些口述性更强的司法档案记录,因此作者往往以读者式的客位视角审视着事件的口述表现,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双线叙事的结构。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中,基于审判记录逐步呈现法官与被告的对话。每当对话中出现争议性细节,金兹堡就停下历史线叙事,转而根据其当下学界关于文艺复兴史的研究现状对叙事中的争议细节进行学术分析。在遇到历史线叙事缺乏史料支撑的地方,作者也会转入现实线剖白叙事的困境“那种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再一次找上我们。”^③这都是典型的“中间语态”书写特征。可是,金兹堡对怀特的批评却尤为激烈,甚至将后者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者。^④

即便被怀特认为使用了“中间语态”书写的史家,也不接受怀特的理论。怀特认为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灭绝的年代》运用了“中间语态”书写。他说“这种作者的退避,正是我希望指出的中间声音(middle-voicedness),就如在我更早期的作品中评论的,叙述者看起来处于被动的客观。”^⑤可是,弗里德兰德对此并不接受。尽管他承认怀特对中间语态书写的阐述有其可借鉴性。他说“部分地存在‘中间声音’,可能会在传统史学和那些采用某些新取径、历史性地形象再现现代灾难的可能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他认为史家如实地使用和表现史料,就可以达成中间语态书写追求的那种客观效果,没有必要强调史学书写对文学表现风格的借鉴。他说“如果我打算使用文学手段来创造一种去现实化的效果,海登·怀特是对的。但是,正如我反复提到的,我只是使用了任何叙事中公认的可能性文体。”^⑥

使用类似“中间语态”书写的历史作品取得成功,可作者们却不承认怀特“中间语态”理论的意义,这可能反映了当前学界在涉及怀特相关话题时的一种现象,即坚持历史实证的学者们对怀特的历史相对主义印象颇深,因此他们不愿与后者的理论产生关联,以免自己也被打上怀疑论的标签。不过,金兹堡和弗里德兰德作品的成功也的确证明,只要不与相对主义的立场搅在一起,“中间语态”理论在实践中有其可行性。

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往往引起关注,却没有博得与之影响力相匹配的好感,并不是他对具体学术问题的评述缺乏道理,而在于他总是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困难和限制视为历史学不具知识合理性的依据。可是,正如自然科学长期以来无法在空间上穷尽对所有实在之物的了解,却仍可被作为可靠认知的主要方式,历史学目前仍无法在内容上全然了解过去,无法在书写上全息表现事实,但

① F. R.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② Cf., Author Marwick, “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The Metaphysical (Including ‘Postmodernism’) 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1, 1995, p.12.

③ 卡罗·金兹堡《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詹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此类表述还见于第59页,第130页,第172页。

④ 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⑤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Truth, Estrangement, and Disbelief”, in Claudio Fogu, Wulf Kansteiner, and Todd Presener eds., *Probing the Ethics of Holocaust Cul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55-56.

⑥ Saul Friedländer, “On ‘Historical Modernism’: A Response to Hayden White”, in *Probing the Ethics of Holocaust Culture*, p.77.

并不意味着其作为求知探索形式的基本设定也要遭到质疑。

Hayden White's "Middle Voice"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Historical Writing

Li Gen & Zhou Gonggu

[Abstract] In 1990, White proposed that historical writing should learn from the style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use a self-deconstructed middle voice. In this way of writing, the author would not only tell the history, but also take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s the object of narration, that is, the state of "the author is in the writing". White believed that this type of writing wa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which the historical data were contradictory and the truth was difficult to learn. Writing history in a deconstructing middle voice will weaken the author's authority of controlling narrative and the coherence of the narrative line,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of past and present appears as an interactive effect of meaning. White's suggestion on middle voice has its presupposition of relativism, but its expression of complex historical events can be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t is suitable for the new tren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such as the enormous amount and audio-visualiz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In addition, it is suitable for readers' desire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history.

[Key words] Hayden White modernism middle voice historical writing

(责任编辑 董立河 刘林海)

(上接第 88 页)

"Froude's Disease": Reason Deficiency in Scientistic Historiography

Li Yong

[Abstract]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advanced the terminology "Froude's Disease" i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view put forward by Edward Augustus Freeman and the materials supplied by Herbert A. L. Fisher. The terminology had been known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book being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Superficially, Freeman belaboured Froude's "Chronic inaccuracy" because of his scientism in historical study, in fact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views from Froude, and also wanting to hit down his opponent in scholarship. Freeman's criticism is one-sided, and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Charles Seignobos used Fisher supplying materials on Froude without surveying it, meanwhile gave up some of Fisher's words that was adverse to themselves, which is antithetical to scientism.

[Key words] "Froude's Disease" Edward Augustus Freem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romanticism scientism

(责任编辑 董立河 刘林海)